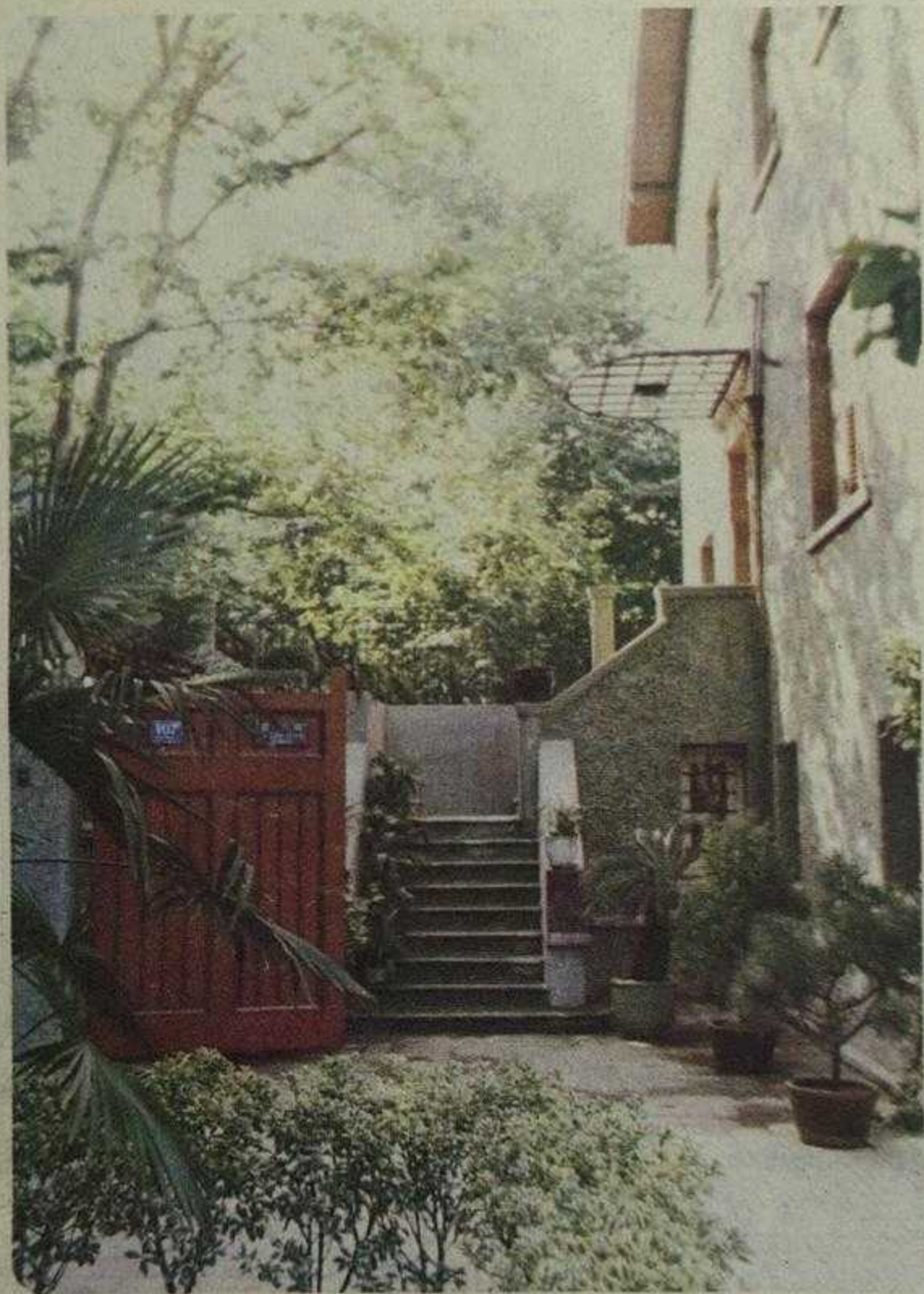


DANZONSHIYUJIAO



党的生活



触目惊心的反革命枪杀案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六日晨六时，南乐县发生了一起重大反革命枪

杀案。县委常委、公安局长李起修及其爱人宋淑珍中弹致死；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冯国华和他的十岁女儿冯红茹中弹受重伤。凶手孙玉山作案后逃离现场，随即自毙身亡。

反革命杀人犯孙玉山，作案前是县公安局行政拘留所负责人。孙犯作案的主要原因是：

(一)反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平反冤假错案和被停职审查心怀不满。在“文化大革命”中，孙玉山是县委机关群众组织

头头之一，他追随林彪、“四人帮”一伙篡党夺权，积极参与迫害老干部，五次收集整理诬陷原县委书记崔毅同志的材料。两次参与对崔毅同志的非法审讯，致使崔毅同志含冤而死。

在复查崔毅同志冤案过程中，发现了孙玉山的错误和罪行。县委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决定，停止孙玉山的工作，责令其检查交代迫害崔毅同志的问题。一九八一年四月，县委对崔毅同志进行了平反昭雪。六月二十四日县委决定给孙玉山撤销党内职务、并建议撤销行政职务、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未公布）。但孙一直坚持错误，直到作案前，他在遗书中还坚持说他迫害崔毅同志没有错误。

(二)持枪进京受到审查，是孙玉山作案的重要原因。一九八二年九月的一天深夜，孙玉山让一名被拘留的妇女跟他走，被对方拒绝。事泄后十分惊慌，说“这一条就够我坐监了”。同年十月二十日突然持枪进京，受到北京市公安治安处扣枪审查。十月二十二日返回南乐后，找公安局领导作假检讨，试探摸底。当局领导指出他在西华门逗留时，他惊恐万状地说：“我可没有在那儿转！如果说我在那儿转了，就冤死我了。”十月二十五日他对公安局副教导员杨书堂边哭边说：“我不能活了，我全家都不能活了，我一个事接着一个事。”杨书堂对此不但不警觉，反而又把从北京领回的手枪，擅自还给孙玉山，直接造成了这次反革命枪杀案。

(三)对于孙玉山的错误，上届县委本来已经作了决定，但是，王文忠任县委书记后，对上届县委

的决定，不但不贯彻执行，反而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又重新提出讨论孙玉山等人的处分问题。县委副书记常石山没有看过孙玉山等人的材料，就在常委会上说材料“太粗”，要求重新调查核实，并说这个案件地委问过，要“向地委疏通一下”。很明显，这都是为包庇孙作准备的。八二年十月，常石山听了公安局关于孙玉山带枪进京问题的汇报后，也没有表示个明确态度。尤其严重的是，县委对孙玉山带枪进京的错误不但没有严肃处理，而且对其在“文革”时的错误和罪行，不作任何复查核实，竟于十一月二日作出了“撤销过去发的停职检查的文件，恢复原来的职务”的决定。把孙玉山在“文革”中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全部否定。

王文忠、常石山等人为孙玉山开脱罪责并非偶然，他们从派性出发，提拔公社、局委级干部四十四人，大多数是和他们同观点的人。其中由王文忠、常石山、张文阁（原县委副书记，已调长垣县）三人互相提名的就多达三十人。他们提拔的这些干部，绝大多数未经组织部门考查，所在单位也没有呈请，更没有民主推荐。他们三人想提谁就提谁，肆意践踏党的组织原则和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特别是王文忠，把自己的两个儿女亲家都提拔了。一个亲家是在这次反革命枪杀案件中负有重大责任的杨书

堂，现年五十二岁，小学文化程度，工作能力差，原则性不强，被提为县公安局副教导员；另一亲家刘建民，原系农委干事，在“四人帮”横行时受影响，也被提为县农委副主任。另外，他们对伙同孙玉山迫害崔毅同志的张新堂不敢提拔重用，却将张的爱人张荣娥（县广播站播音员）提为县妇联副主任。群众意见很大。常石山的弟弟常同山，提拔为县民政局副局长。此人原在邮电局工作，一九八〇年调县工商局任办公室主任，提拔时征求工商局意见，因他好吃喝拉拢，工作态度不好，三个局长都不同意。提上去后群众议论纷纷。

从上述材料看，孙玉山反革命枪杀案的发生，是与王文忠、常石山同志的纵容、包庇有直接关系的。为严肃党纪，教育党员和干部，挽回不良影响，经省委常委研究决定：给予南乐县委书记王文忠同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撤销常石山同志南乐县委副书记职务，并建议撤销其县长职务；开除杨书堂的党籍；免去张文阁同志长垣县委副书记职务。

（省纪委筹备组）



· 短评 ·

从血的教训中 看清理“三种人”的紧迫性

《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指出：“‘三种人’反对党、危害党，如不彻底清理，就会成为党的严重隐患。清理‘三种人’，是纯洁组织的关键问题。”最近几年，党中央反复强调清理“三种人”的重要性，特别是把清理“三种人”作为这次整党是不是走过场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全党同志的高度重视。南乐县的反革命枪杀案，就是“三种人”在原县委书记王文忠等人的庇护下，公开向无产阶级专政疯狂反扑的例证。这个触目惊心的血的教训，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队伍中那些头脑昏昏的同志从中汲取教训吗？

“三种人”是最危险的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这几年，对这些人的清理，我们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总的讲，态度还是坚决的。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确实还有隐藏下来的“三种人”没有得到严肃处理。有的虽然被清除出党，但立场并没有改变，他们内外勾联，结成了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有的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在政治、思想、组织、经济等方面兴风作浪；有的组织反革命集团，妄图颠覆我们的政权；有的持枪杀人，进行反革命报复；有的伪装积极，妄图从夹缝中钻进我们的领导班子；有的办地下刊物，制造思想混乱；有的公开发表攻击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大搞精神污染；有的政治上垮台妄图从经济上发财，进行经济犯罪活动等等。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这次整党把清理“三种人”作为纯洁组织的关键，是完全正确的。“三种人”和其它各种错误严重、危害严重的人的问题如不解决，的确是很危险的，势必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

南乐事件所以能够构成，就是因为以原县委书记王文忠为首的县委班子，丧失党性，大搞派性，在派性的掩护下，才使孙玉山有可能存身于要害部门，得以重用；再加上原县委和公安局的同志在派性的干扰下，政治上完全失去了警觉，麻木不仁，致使其行凶得逞。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啊！

我们应从南乐事件汲取教训，提高对“三种人”的危害性、危险性的认识，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所以，我们全党的同志，

千万不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我们一定要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党中央绝对保持一持，下最大决心，用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进行这次整党，彻底清理“三种人”，纯洁党的组织，争取全面整党的彻底胜利。

共产党员贾风阁，是安阳县公安局刑警队队长。

一九八二年夏天，县里有一个局长的儿子犯了罪，那个局长拿着一位领导写的条子去找贾风阁求情。条子上写道：“青少年犯罪，请贾队长考虑。”他一看条子，严肃地说：“我们是依法办案，不是围着某个人的条子转。回去告诉写条子的领导，希望他不要乱插手！”后来，那个局长的儿子被依法处理。

去年有一天，与贾风阁共事多年的一位老知己去找他：“你侄儿因流氓犯罪被抓，气得我躺了三天，哭了几次。想来想去，找你比求谁都得力……”贾风阁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是个人私事，你的困难再大，我也帮忙，这件事咱可寸步不让！”老知己急了：“咱俩过去亲密无间，今天一点面子都不讲吗？”贾风阁回答：“执法得分清丁卯，国法要比面子大！”老知己看没有“后门”可敲，只好转身回去。

（王永兰）

党员不伸手 分房不发愁

去年十一月下旬，商丘市手帕厂建成一幢两千四百平方米家属楼。这幢楼房只能安排四十户职工，而写住房申请的就有二百一十七户。

分房委员会经过逐户调查、对比、筛选，仍有五十七户应该分配住房。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厂党总支要求党员干部以身作则，端正党

风，带头让房。党总支副书记牛兰英、共产党员焦素玲主动为厂分忧，未递住房申请。但是，分房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把她们列入了分房范围。她们知道后，马上找领导声明：我们是党员，不能与群众争利，把房子让给更困难的同志。共产党员张玲娣、孔素贞，也主动撤回了住房申请。

党员不伸手，分房不发愁。仅七天时间，不仅顺利地把新房分配到户，而且还为六十户职工调整了住房。

（张同德）

执法分丁卯



党的生活

2



河南1984

积极慎重发展青年农民入党

安阳县都里公社东水大队近几年，随着人口的自然减员，无党员的生产队逐年增加。党支部认识到，不抓紧培养发展青年党员，党员队伍就会青黄不接。一九八二年冬天以来，他们加紧培养教育从青年农民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利用晚上和农闲时间，给青年们讲解党的基础知识，引导他们学习新党章，加深对党的认识，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通过教育培养，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农民逐渐增多，不少人写了入党申请书。党支部按照党章要求，经过全面考察，发展了十一名新党员。其中三名在大队领导班子中担任了职务。（杨东海 史东林）

文明之乡面貌新

“精神文明之乡”的伊川县马回营大队，近几年来，党支部扎扎实实抓了五件事：

一、建立了俱乐部。购买图书四千册，订阅报纸、杂志十多种，还买有电影机、电视机和文体活动器材。经常组织农民读书、看报，开展文体活动，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

二、恢复和扩建了“文革”中停办的农业技术学校，开办了业余中学、业余小学，开设了农技、编织、机绣等五个专业，一九八〇年以来，培养了三百一十二名技术人才。

三、对农民进行政策、法制和精神文明教育。

四、整修了街容村貌。党支部组织社员利用农闲时间整修街道，铺沙石路面四千九百米，植树五万八千棵，把全村三十多条街巷美化一新。

五、成立了农民科学技术协会。会员们坚持生产与科研相结合，开展土壤分析、虫情测报，培育良种等活动；按农时编写、印发科学技术资料；深入田间地头传授技术，指导生产，带动广大农民掀起了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

（王德君 董昭武 张振惠）

训；二是下促上帮相结合，发动党员揭露矛盾；三是用先进典型启发。最后，公社党委在普遍制定规划的基础上，对基层党支部和党员提出今后五项具体要求：一、认真学习整党文件，继续提高认识；二、坚持“三会一课”制度，进一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三、边学边改，进一步端正党风；四、建设精神文明，抵制不正之风；五、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开展党员联户文明组活动。

（党员教育处供稿）



吸取教训提高认识把清理“三种人”的工作抓紧抓好

中共南乐县委员会

正当我们根据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的要求和省委整党的部署,认真学习整党文件的时候,一九八四年《党的生活》第一期刊登了我县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六日发生的反革命枪杀事件,再次使我们县委及全县党员、干部从反面受到深刻的教育。

《决定》明确指出:“‘三种人’反对党,危害党,如不彻底清理,就会成为党的严重隐患。”我们县发生的反革命枪杀事件,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通过这一流血事件,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三种人”的狰狞面目,并痛苦地尝到了“三种人”所造成的苦果。通过对这一“苦果”的回味,我们深刻地理解了党中央一再号召清理“三种人”的重大意义。懂得了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清理“三种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的深远含意。

集中训练党员为整党做准备

浙川县大石桥公社党委,在组织党员认真学习整党文件中,集中训练了全体党员。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为全面整党做准备。

学习班前,公社党委先开筹备会。党委成员首先学习整党文件,武装思想,分析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状况,制定学习方案,准备有关材料。整个学习班,采取学习文件,宣讲辅导,联系实际,组织讨论,制定规划的办法进行。党员在自学文件的基础上,由公社党委成员分别做专题辅导。在认真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引导党员联系实际,开展“三查两看”:查思想、查作风、查纪律;看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如何,看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怎样?严肃认真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公社党委始终把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党性作为重点来抓,使每个党员明确“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什么要整党,整党的意义是什么?”等十个问题。他们还把对基层支部成员的教育提高摆在突出的位置。其做法是:一是派人到一般的特别是涣散软弱的支部去,和每个成员谈心,帮其总结经验教

这起反革命枪杀案发生在我们县，无疑是一件坏事；但是在这次整党中，它又可作为我们的反面教材，起到前车之鉴的作用。从这一事件中，我们是有深刻的教训的：一是原县委班子组织纪律松弛，长时间处于软弱涣散状态，是这一案件发生的前提。当时县委主要负责人，在思想认识上并不十分清楚什么是“三种人”，而且放松了对“三种人”危害性的防范和警惕。组织纪律松弛，甚至县委研究对“三种人”的审查和处理意见，“三种人”经过不正当的活动，可以随时弄到手。这就大大削弱了县委的领导作用和战斗力，并给“三种人”制造事端，以许多可乘之机；二是原县委主要负责人受派性干扰，是这一案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在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遗留问题时，原县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是带有倾向性的。“三种人”孙玉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理应受到审查和处理，但他对审查极为不满，对处理极力抵触，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原县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却对此过分容忍，对此人的处理优柔寡断，下不了决心。这就使孙玉山有恃无恐；三是组织措施不得力，给这一案件发生留下了机会。对于“三种人”的审查一开始就应采取组织措施，调离要害部门。特别是事实已经查清，处理意见已经定下来后，更应果断地采取组织措施。但由于上述及其他原因，孙玉山始终没有调离公安部门。这就给他留下了一个作案的机会。总之，领导班子的软弱涣散，派性干扰，组织措施不得力，是这一案件发生的原因和教训，也是我们整党中在清理“三种人”这一关键问题上，应特别注意和加以解决的问题。

基于上述血的教训，我们决心抓好清理“三种人”这一关键问题，实现纯洁党组织这一重要目的。为此，我们县委在整党中首先要做到：进一步学习文件精神，武装思想，统一认识，决不允许有半点软弱涣散的现象存在，决不允许象邓小平同志批评的那样，对坏人坏事“过份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要认真掌握政策界限，把“三种人”彻底清除出党。

其次，要坚持党性立场，排除派性干扰。在十年内乱中，南乐是“重灾县”，在整党和清理“三种人”中应特别警惕派性干扰。一是要排除来自下边的派性干扰，二是要排除县委班子内部的派性干扰，特别是县委班子内部的派性，危害大，影响广，应下决心彻底排除，一定要把思想路线摆端正，真正做到党中央反复指出的，“文化大革命”中不管参加那一派组织，只要是“三种人”，都要坚决清理。

其三，加强对清理“三种人”工作的领导。为了使清理“三种人”工作顺利进行，县委决定组织力量，成立机构，专门负责清理“三种人”的工作。由组织部、纪检会、宣传部、统战部、劳动、人事局等单位抽调得力干部，组成一个班子，扎扎实实地把清理“三种人”的工作搞彻底。

浙川县坚决纠正“农转非”

工作中的不正之风

为端正党风，纠正“农转非”工作中的不正之风，中共浙川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一九七八年起，借纠正冤、假、错案之机，弄虚作假、欺骗组织、非法搞“平反复工”、“农转非”的人员逐人逐户进行清理。目前，已注销非农业人口三十人，纠正假“平反复工”、“农转非”三十五人；给予党纪处分六人，判刑一人。（徐海涛）

铁面无私的监考官

去年六月，社旗县城关镇要从千余名待业青年中招收五十名集体工。为了堵死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镇党委决定采取考试的办法，择优录用。

六月二十六日，在城关镇第四小学举行考试。副镇长、共产党员宋万成是监考负责人之一，他走进第二考场，发现自己的二女儿来替弟弟考试。他立即向该考场监考人王正善同志说明情况，并将女儿赶出考场，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取消了儿子的考试资格。

此事很快传遍全镇，干部、群

众都说：“老宋是铁面无私的监考官！”

（端德保）

开封县袁坊公社卫生院党支部书记、副院长崔兆兴，弄虚作假，欺骗组织，虚报计划生育手术成绩，骗取荣誉和结扎手术费，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

一九八三年四至五月份，袁坊公社卫生院实作结扎手术二百四十一人，崔为了骗取荣誉，多得手术费和奖金，将本公社在外地做结扎手术的二百三十五人，作为本院结扎手术人数，又伪造手术假名单一百三十三人，共多报结扎手术三百六十八人，由崔亲自报送县计划生育委员会，骗取结扎手续费五千五百二十八元一角三分。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为端正党风，严肃党纪，经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决定：给予崔兆兴撤销党支部书记处分；建议行政撤销其副院长职务；收回全部骗款，并通报全县。

（克一信）

崔兆兴虚报计划生育成绩受到处分



毛主席在庐山（一九六一年）



他又拿出四万元，帮助乡政府建一所重点初中……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专业户所展示的宽广胸怀……

村、乡、县各级党委和政府发出通报，表彰他致富不忘国家和人民的先进事迹。

市教育局发出通报，号召全市教职员向他学习。

《中国社队企业报》、《读者文摘》、《河南日报》刊登了他的事迹和专访，人们对于有如此科学头脑和广阔胸怀的人充满敬意。

短短三个月，近两千封来信象雪花似的飞来了。对于人们的热情鼓励，蔡育诚心里暖烘烘的。对要求介绍致富经验、询问小复合肥厂的设备、生产工艺的信件，蔡育诚复印了数千份简介，一一回复。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最多时一天达三十多起。蔡育诚热情地接待，耐心地介绍，有时一谈就是半夜。他知道，人家千里迢迢跑来，是想取得一点真经。

当然，他还接到一些向他借钱的信件，有的一张嘴就是二千元……对于这些信件，他苦笑着，他不了解实情。而在乡亲们中间，他已借出五六千元……

“育诚，你把设备卖给队里吧？”村民组长姚运阁突然找到他。

蔡育诚摇摇头。

“那原订合同无效，重新订合同。”姚组长又说。

蔡育诚拿出和队里签的合同，

有效期二年，而现在才过一年。

“那合同不算数，你每年应向队里交八千元。”姚组长终于说出心里话。（按：这是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应有的态度吗？他懂不懂党对农村的现行政策？这不是“红眼病”发作又是什么呢？）

蔡育诚愣住了。原来每年交一千，现在上涨了七倍？他想不通，找到乡里，有位领导说：“乡里给你划片地，你搬出来算了。”

难道一搬了之吗？今后别的专业户遇到刁难，也都要搬吗？不！蔡育诚下定决心：专业户不能这样任人宰割！

他将自己的想法反映给县委欧书记，欧书记亲自过问此事，队里才勉强承认合同的合法性。

可是——

二月十五日，流经厂里南边的水渠突然露了底，停水了。无水，生产就得停下。可有时候，突然来了水，水流不及，漫出渠道，浸泡三米外群众的住房。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想借群众之口让他走？他苦苦思索着，只好停产一天，用拖拉机拉土把水渠岸加宽。

蔡育诚出钱，村里群众大多数用上了水管，可没有给蔡育诚家安，玉荣还要到一百多米外去挑水。常常挑回一肚子气。有人问她：“给教育上拿几万块，才给村里几千块，想出名吧？”

春节，妻子大门没出，一连睡了好几天。往常可不是这样，早拉着孩子走门串户去了。现在，她不愿意



《延津县委以权谋私问题严重》一文 引起强烈反响

本刊今年第七期刊登了严纪申同志的来信：《延津县委以权谋私问题严重》及本刊评论员文章《营私以为羞》，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纷纷投书本刊，对延津县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问题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现将延津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反映和部分读者来信摘登如下：
延津群众反映：

再出去了，她受不了那些人难以描述的目光。（按：专业户的苦衷，为党、为国、为地方做了贡献后的苦衷，村党支部、乡党委领导同志又做何感想？）

今天，妻子挨打了，工厂停产了！这是儿戏吗？能说停就停吗？厂虽小，产品远销几个省市，如不按合同及时供货。罚款事小，影响了这么多用户的生产事大呀！这不单是一个厂的事了，这是牵扯到几个省的用户的大事情，不能就这样说停就停！（按：专业户能经得起这样折腾吗？这里的党组织为何不能出面管管？）

蔡育诚就这样倚着门框站着，夜风拂弄着他的脸，使他清醒许多。他想起今年的一号文件，想起

△《党的生活》第七期目录在《河南日报》刊登后，在我县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都等待着看文章内容。今天见了文章，我认为主要事实是存在的，文章观点鲜明，对问题看得透，性定得准，对我县下一步整党肯定会起推动作用。

△①此稿所写的事实基本属实。②延津县委的不正之风是应该

不久前田纪云副总理和刘杰书记在接见几个专业户时的谈话。他觉得自己没有错，他天明一定要去找乡、县领导，把情况向他们反映，求得他们的支持。他们一定会支持他的。对于这一点，他深信不疑。（按：当我们编好这篇稿子的时候，郑州市委书记蒋靳非同志接到我部关于蔡育诚受刁难的内参，立即作出批示，要求荥阳县迅速解决这个问题。县委即着手进行处理。省委负责同志也非常重视，并派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协同郑州市委负责同志再次对蔡育诚遭难一事作了调查。现在蔡育诚已恢复了生产。对蔡进行刁难，打击的有关同志也作了检讨。不过，事态发展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立即解决的。

△《党的生活》为延津人民出了气，县委对抗中央指示，败坏党风，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他们在选举县委时就采取了拉帮结派的不正当手段，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继续推行“四人帮”那一套，明显地对“揭批查”积极分子进行打击迫害。

△由于延津县委、县政府一些领导以权谋私，拉帮结派问题严重，在延津县内一般人是不敢向他们提反面意见的，向县委提意见会肋断骨折的。分房建房问题就充分证明，由于县委带头破坏党的纪律，下边也就随着干。如县粮食局新任局长申某，今年元月份调入粮食局，二月份就修建了私人家属院一处，基建面积为一百二十平方米，院子占地六分多，用去干部福利基金一万一千元，群众意见很大。

△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在为县委的错误进进辩护，只字不提县委领导所犯错误的基本事实，而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千方百计地为县委推脱责任。

读者来信摘登：

坚决同以权谋私的行为作斗争

《党的生活》一九八四年第七期，发表的严纪申同志的来信，揭露了延津县委、县政府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盖独院、乱摊派、违法乱纪的行为，读后令人十分气愤。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为端正党风，全党自上而下作出了极大努力，进行了大量工作。广大党员对这个关系到党的存亡的重大问题，不仅在认识上有很大提高，而且在行动上也越来越自觉地纠正和抵制不正之风。但是，延津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干部，竟然置关系到党的存亡问题于不顾，以身乱纪，其错误是非常严重的。

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党同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建立起的血肉联系，是我们进行伟大斗争的重要保证。《准则》明确规定：“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力。”延津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干部，按《准则》办了吗？没有！他们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在搞特殊化上，把人民辛勤劳动的血汗，用在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上，严重地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破坏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怎能不引起党内外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

对于延津县委这样严重的错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决不能保持缄默。为此，建议上级党组织进一步清查他们的错误事实，根据其检查错误的态度，进行严肃处理。并以此为镜子，教育全党。（王西中）

违纪建房，必须严肃处理

看了《党的生活》第七期刊登的《延津县委以权谋私问题严重》一文之后，感到气愤。

加强党员教育工作队伍的建设

本刊评论员

党的十二大以来，特别是全国、全省党员教育工作会议之后，我省各级党组织普遍开展了以学习新党章和《邓小平文选》为主要内容的党员教育，从而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促进了党风的进一步好转，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必须看到，不少地方和单位，党员教育工作做得还不够经常、不够系统、不够深入，有的还没有改变零打碎敲、时抓时停的状况，同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很不相适应。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党员教育机构不健全、人员少、力量弱，各项工作不能很好落实。

目前，住房问题是社会上的议论中心，也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不同人对待住房持有不同态度。一是想着他人，主动让房；二是对照政策主动退房；三是追求“荣华富贵”，为自己建造独楼独院。延津县的鲍宗灿、张生才、李宗英等人就是例子。他们不问群众疾苦，不顾党的影响，为自己建起高标准、超面积之独家院，这种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和违纪行为，是与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不相容的。

党风、社会风气一定要好转，

因此，为了实现党员教育工作经常化、制度化，迫切需要加强党员教育队伍的建设。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斗争的中心环节。”要实现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总目标，关键在于按照十二大和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党员思想教育，使所有党员不断提高对党的性质、纲领、任务和党员标准的认识，提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认识，百折不挠地为实现党的总任务和总目标自觉奋斗。而做好党员思想工作，是全党的一项长期的、带

这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向。鲍宗灿、张生才、李宗英等人，对抗中央指示，违反党的纪律，大肆建造独家院，决不能叫他们“检讨一阵子，舒服一辈子”。对他们在政治上必须严肃处理，在经济上也一定要给予制裁。由此，也奉劝那些以权谋私者要引以为戒。要想社会主义四化的大业，不要打个人的“小九九”！（树仁）

（关于延津县委的问题，我们还将继续报道。也欢迎广大读者就此继续发表意见。）

刘景菊三拒随军

刘景菊是民权县人和乡杨庄村民组妇代会主任，她的丈夫李玉斌一九六〇年入伍，一直在甘肃某部队工作。他们夫妻之间有一段三拒随军的故事。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五日，李玉斌在施工爆破中身负重伤，景菊赴甘肃护理四十余天。玉斌康复后，景菊该回家了，丈夫喜滋滋地告诉她：“部队领导为照顾我的身体，批准你随军了。”

景菊没有喜形于色，心中反复掂量：眼下随军自然无人非议，和丈夫在一起生活是幸福的。可家里呢，上有年迈的公婆，下有四个妹妹和三个弟弟。全靠工分吃饭的十口之家，算自己才两个半劳力。这几年自己拚命劳动，年终还得拿缺粮款二、三百元。这个家我咋能离开呀！她与丈夫商量后，把“指标”退了回去。

恰逢杨庄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九八〇年春，景菊又收到丈夫一封来信。信中说部队开垦一个农场，他符合安排农场家属的条件。公爹闻讯对景菊说：“现在大包干了，

幅图解画前也拥满了人。人们有的在全神贯注地听，有的在不停手地记，有的在热烈地商讨。好一派“科学热”！

（魏小林）

牛明堂 白立功

你弟弟妹妹都成了棒劳力，你放心吧。”

景菊看着日趋衰老的公爹，摇了摇头，说：“我不能去。三弟不久要结婚，二妹要出嫁，还得再为四弟盖房子。这些光靠您老人家一个，能担得起？”公爹深知此情，于是采取了不劝不阻的“折衷主义”。

景菊毅然回信拒绝。她以家庭主妇的身份，先后主持盖起十二间瓦房，给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完了婚事。

今年春节，丈夫回来探亲，又对她讲：“你把家里的事操持得也差不多了，眼下咱都是四十几的人啦，该团圆啦！”

“我何尝不想和你在一块生活。不过这两年又出现了新情况。”

“啥？”

“计划生育！这两年我负责计划生育，全村需引产流产、结扎上环的，大部分靠我去做工作。现在我一拍屁股跟你走，计划生育就要出漏子！”

“好吧！我不再劝你啦！”

丈夫三劝随军，景菊三拆“鹊桥”。在不断延伸的“牛郎织女”道路上，刘景菊留下一串金子般的心。

绝不可低估“三种人”的势力

钟 宪

《党的生活》在今年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触目惊心的反革命枪杀案》，读后使人震惊，发人深思。

杀人凶手孙玉山曾经是一个“风云人物”，在“文革”中，这个派头头积极参与迫害老干部，多次收集整理诬陷原县委书记崔毅的材料，几次参与对崔毅的非法审讯，致使崔毅同志含冤而死。他凭着这些“功劳”，当上了县公安局行政拘留所的负责人。一九八一年四月，县委给崔毅平反昭雪，六月决定给孙玉山以撤销党内职务、并建议撤销行政职务、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但他不思悔改，直至发展到一九八二年十月持枪进京在西华门一带活动，受到北京市公安机关的扣枪审查。同年十一月进行反革命凶杀：造成两人丧命，两人重伤，本人自毙。

孙玉山不过是“四人帮”残余分子中的一个，由他表现出来的是股有野心的反动的政治势力。这种势力是由一部分隐藏下来没有得到严肃处理，和一些虽被清除出党但没有改变其政治立场的“三种人”，内外勾结而成的，他们对党和人民有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些人有的伪装积极，妄图保住已经到手的领导权；有的暗中活动，妄图颠覆我们

的政权；有的私办地方刊物，搞自由化，制造思想混乱；有的打着创作自由、理论研究的幌子，大搞精神污染；有的持枪杀人，进行反革命报复；有的在政治上垮台，就在经济上进行各种犯罪活动。这种势力，潜隐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影响到四化大业的各个方面。广东海丰县王仲等人的经济犯罪、山西运城地区仝有才等人的私建住房，以及南乐县孙玉山进行的这起反革命枪杀案，就是这种势力在社会上的表现。所有这些，充分说明，“三种人”是一股不可小视的政治势力，如不坚决彻底的清除干净，就会留下祸根，后患无穷。

整党决定指出：“‘三种人’反对党，危害党，如不彻底清理，就会成为党的严重隐患。清理‘三种人’，是纯洁组织的关键问题。”这就从根本上给我们规定了任务。我们应从孙玉山等人的案件中，提高对“三种人”危害性和危险性的认识，下最大的决心，做过细的工作，坚决地把“三种人”从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



读后
感

甘把余热献人民的共产党员
赵学诗（事迹见本期内文）

张天恩摄



党的生活

清理“三种人” 消除大隐患

本刊评论员

“三种人”是靠“文革”起家的“乱世英雄”。他们在“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拉帮结派，造反夺权，迫害干部群众，挑动武斗，制造事端，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劫难。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还明里暗里同党、同人民对着干。其中一些死心塌地的顽固分子，敌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诬蔑大好形势，诽谤中央领导同志，组织反革命集团，妄图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夺回他们失去的“帮天下”。本刊这一期所披露的以张三益等“四人帮”残余势力，即“三种人”为骨干的“中华民族联合阵线”重大反革命集团案，就是一个佐证。

这个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采取秘密串联的方式，网罗死党和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有组织、有纲领地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其用心之险恶，手段之诡秘，令人发指！他们散布大量反革命言论，阴谋印发反革命传单，以蛊惑人心。他们策划抢劫枪支弹药，搞“镇压”，搞“大震动”，并狂妄地叫嚣：“要把江青弄出来领着干”，“彻底推翻”现政权，建立新政权。反革命气焰何其嚣张！

这个“中华民族联合阵线”反革命集团兴风作浪的事实，就足以说明“三种人”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是党内最不安定，最危险的因素。因此，全面否定“文革”，彻底清理“三种人”，就成了这次整党，纯洁党的队伍的关键。不清除“三种人”，他们就会在适当时机重新跳出来，为非作歹，继续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清除“三种人”，就不能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提高党的战斗力；不清理“三种人”，就难以保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难以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如果我们放松警惕，让“三种人”混进“第三梯队”，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那就会贻患无穷。

薄一波同志最近强调指出，在清理“三种人”过程中，要坚决贯彻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的方针。各级党委应切实抓好清理“三种人”这件事关重大的工作，充分利用当前政通人和的大好形势，克服派性干扰，克服软弱无力现象，冲破各种阻力，有重点、分步骤地把隐藏在各个角落的“三种人”彻底清理出来，以确保整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昔日“文革”英雄 今日阶下囚徒

我省破获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团案

本刊通讯员张连兴

本刊记者 王国庆

最近，我省破获了以“四人帮”残余分子为骨干，即以“三种人”为主要成员的重大反革命集团“中华民族联合阵线”。这个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采取秘密串联的方式，网罗“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和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敌视和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恶毒诽谤中央领导同志，为“四人帮”鸣冤叫屈，制定他们的党旗、国旗，策划筹集活动经费，预谋印发反革命传单，密谋抢劫枪支弹药，妄图“亮牌子”、“搞大震动”，扬言“要把江青弄出来领着干”，“彻底推翻”现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

这件触目惊心，振聋发聩的大案，清楚地告诉我们：“三种人”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是党内最不安定、最危险的因素。不把他们彻底清理出来，必然会留下可怕的隐患。

今年七月，周口、洛阳、平顶山地、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召开宣

判大会，判处以张三益为首的“中华民族联合阵线”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八名罪犯一至十五年有期徒刑，有力地打击了这帮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

一、“三种人”确实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

被判刑的十八名罪犯中，“四人帮”的残余分子就有十三人，其中有原县级党员干部六人。首犯张三益，原周口地区邮电局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文革”中极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得到赏识，由机线员提拔为局领导。七七年因奸污妇女被免职、开除党籍；主犯李济川“文革”中因造反有功，被提拔为县委副书记、地委委员、县委第一书记。一九七八年因“文革”中错误严重被免职；主犯王廷彦、韩振文因造反得力都被提拔当过县委副书记；主犯任延庆在“文革”中曾任河南最大的造反组织“二七公社”作战部部长、郑州大学革委会副主任、临汝县委常委。主犯邱连庆，曾任“二七公社”周口市蔬菜联委服务员。上述几名主

要成员，在粉碎“四人帮”后都被免职，受到了应得的处分。但他们不思悔改，仍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进而参与反革命阴谋活动，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二、秘密串联，组织反革命集团，发展反革命成员。

首犯张三益被免职后，对现实产生不满，便进行反革命串联活动。他与邱连庆、赵洪范（反革命组织“世同党”主犯，已另案处理）、任延庆、李济川等人一起，散布反动言论，诬蔑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和中央领导同志。采取谈形势、对观点和封建迷信活动等手段，利用“滚雪球”的形式和单线联系的办法，积极拼凑反革命势力，组织反革命集团。

一九八〇年秋，张三益在和邱连庆串联的基础上，到项城县李济川处，分析形势，两人密谋要作好两个准备：一是象过去路线斗争那样，通过路线斗争解决问题。如果不行，就采取单线联系，多联络人，一旦上边有人干，就积极响应。张三益回到周口后，就积极进行反革命串联。他和邱连庆一起去临汝找到任延庆等，给他们讲了与李济川谈话的内容，并煽动说：“我们这些人，怎么样都没有好结果，唯一的办法就是和他们干，必须把他们的国家机器砸碎，建立一个新政权。”

一九八〇年八月，张三益等到鹿邑汪祖佑家，商讨了发展反革命成员、推翻现政权及在商邱召开反

革命会议等事项。

张三益、赵洪范、邱连庆等人纠合在一起组织反革命集团。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张三益又到平顶山发展反革命成员。

一九八三年三月，任延庆到周口同张三益、王廷彦、田好振等进行阴谋活动。任说“洛阳地处伏牛山区，已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全区基本有了核心，形成了拳头。”“临汝是我工作十多年的地方，是块根据地。”任还建议“今年暑假时，在少林寺开个各地区代表会”，并提出当前要“暗地活动，先找人员，发展组织”。

三、召开反革命会议，制定反革命纲领，确定反革命核心，散布反革命言论。

这个反革命集团从舆论到形成先后召开反革命会议十七次，制定了反革命纲领，确定了反革命集团核心，散布了大量的反革命言论，并多次进行密谋策划，搞破坏行动。

一九八二年十月底，邱连庆、赵洪范、赵春之（反革命组织“世同党”主犯，已另案处理）等人开会，讨论了反革命纲领的内容。邱提出：既不走毛主席的路线，也不走国民党的路线。赵洪范说：走咱自己的路线。赵春之说：打倒马列主义的叛逆者。邱又提出组织名称叫“民族救国统一战线。”赵说叫“世同党”，党旗用斧子和铁锹交叉组成，表示打倒旧政权，开劈新天地，建立新国家。会上还确定了核心由七人组成，张三益“扛大

旗”。赵洪范协助张三益工作，邱连庆、陈学顺负责组织、武装和经费。下设办公厅（秘书处），由赵春之等负责。事后，由赵春之草拟了反革命纲领《民族救国联合战线纲领草案》和《世同党章程草案》。内容极为反动：声称要“打倒马列主义的叛逆者”，“为达到世界大同而奋斗”，污蔑我们“工厂倒闭，工人解雇，无工做，无饭吃，无衣穿。”纲领草拟成后，他们又开会商议，邱连庆说：“为了扩大影响，对他们（指政府）震动一下，三益和我研究过几次，决定搞‘飘’（即反革命传单）。”一九八三年元月，张三益在平顶山市郊薛庄自己的家里，召集任延庆、邱连庆等人开会，又研究了组织名称、旗帜、对外联络、“震动”等问题。任延庆提出：枪支不要搞长的，要搞短的。经济问题，不论是抢私人的，还是国营供销社、银行的都要慎重。搞“震动”，把已形成的那两个文件修改一下，变成传单，到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大城市去散发，在国内外造成巨大影响。他认为搞镇压震动性更大，提出要经过研究，选准“作恶多端”的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县长，一个县镇压一个，再搞点文字说明，以便扩大影响。八三年二月初，张从平顶山回周口后，又召集邱连庆、田好振等讨论修改纲领。决定让田把反革命纲领修改好。田拿着材料找王廷彦修改，拟出了第二草的《中华民族解放阵线

章程草案》，后被任延庆改为《中华民族联合阵线章程草案》，并修改多处，成了有总纲和三章十三条的反革命纲领，内容极为反动。它恶毒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叫嚷“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已处在危急之中，要团结起来，彻底推翻×××集团，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建立各级政权。”确定了加入组织的条件，制定了组织纪律和组织机构形式，绘制了“中华民族联合阵线”的旗帜图案，说明是长比宽为三比二的红色大旗，中间为黄色火炬照耀着中国地图。

一九八三年五月上旬，张三益又召集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开会，妄图借整党之机，进行破坏。张提出要利用下半年整党，起草个东西，以纠集在整党中“受打击，下了台”的人。王廷彦说：“这是个好机会。一个体制改革，一个整党，一批人肯定会受到伤害。我考虑写一份《告全党同志书》，在适当的时候抛出去。要用“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落款。”田好振说：“我的意见是要搞就大搞，在上海、北京、天津、郑州等地同时抛出，在全国震动一下子。”

玩火者必自焚。凶暴残忍、不可一世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都避免不了折戟沉沙、全军覆灭的命运，几个顽固的“三种人”，在形势大好的今天，还能逃脱了历史的惩罚吗？

统一思想 整顿作风 加强纪律 纯洁组织

邵振业等包庇重用『三种人』受到党纪处分

编者按：清理“三种人”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我们的方针是，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南阳地委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严肃认真的。当前，一些单位核查“三种人”的工作，之所以进展迟缓，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对核查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思想麻痹，软弱无力。有的领导同志甚至对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人进行袒护、包庇。有些单位至今仍有派性干扰。这一问题应引起各级党委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一定要按照中央整党决定的精神，严肃认真地做好这一工作。凡发现有包庇纵容“三种人”或干扰核查工作进行的，一定要认真查明情况，严肃处理。

南阳市酒精厂原党委书记邵振业、副书记高应德等，因包庇重用打砸抢分子梁明武，分别受到党纪处分。

梁明武原在民航总局政治部工作，“文革”期间，积极造反，是该单位“飞虎队”（打人队）成员，他曾亲自动手毒打过干部群众十三人，造成五人伤残；在林彪反革命事件中，他又参与刘锦平一伙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五年，梁复员到南阳市酒精厂当工人。一九七八年元月，民航总局将梁明武在“文革”中所犯错误事实的材料派人送交酒精厂党委。当时厂党委副书记王强和政治处主任黄学德听了情况介绍，接收了材料，随即向厂党委书记邵振业作了汇报，但并未引起他



们的重视。之后，黄学德就把材料压了起来，直到他调动工作也未办理交接手续，到一九八三年七月，组织上追查时才交了出来。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在接到这些材料后，分管揭批查工作的王强同志，明知梁有严重问题，却还让他搞揭批查专案工作。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底，邵振业又提名将梁明武提拔为动力车间党支部副书记，并且不向党委介绍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而一味说他到厂后“表现较好”。一九七九年十月，该厂又将梁调厂保卫科任副科长。一九八一年七月，南阳市纪委筹备组将民航总局再次转来的关于梁明武所犯错误的揭发证明材料转给酒精厂，并要求酒精厂对梁进行调查处理。厂党委副书记高应德收到材料后，向邵作了汇报，并让他和当时的政治处主任尹绍卿看了材料。邵在这之后虽让高找梁谈过话，梁也承认打过人，但仍未引起重视并进行调查处理。直到一九八二年十月，地、市驻厂企业整顿调查组与厂领导研究中层干部时，向邵提出梁在“文革”中打人的问题是否弄清时，邵振业还说：“我了解这个情况，没啥问题。”高应德、尹绍卿对此也没提出异议，反而又将梁明武由保卫科副科长提为科长。由于邵振业等同志的包庇，致使梁明武的问题长期不能得到正确处理。

为严肃党纪，教育本人，经中共南阳地委研究决定：给予南阳市酒精厂原党委书记邵振业同志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原党委副书记高应德、王强同志和原政治处主任黄学德同志党内警告处分；原政治处主任尹绍卿同志检查认识较好，不给纪律处分。

对梁明武的问题，在这次核查“三种人”工作中已经彻底查清，被定为打砸抢分子，已决定开除其党籍。

（转自省委《整党工作通报》）

【王忠阳插图】

内黄县是我省一九八三年整党试点单位。在整党后期，由于县外贸局党组成员王党振在“文革”期间问题严重，被劝退出党。但县外贸局长、党组书记吴兆明同志，却丧失党性原则，一再袒护王党振，并且刁难揭发王党振问题的同志，致使王党振的问题长期得不到处理。

“文革”期间，王党振带头造反，曾任内黄县后河公社“二七”分部服务员，一九六八年结合为公社革委会常委。同年八月，王亲自参加了抓捕对立派群众组织头头袁万森，还伙同他人一起对袁捆绑吊打，将袁万森残酷迫害致死。王还多次主持会议，揪斗迫害干部群

吴兆明包庇“三种人”
打击揭发人被撤销党内职务



以整党促进商业体制的改革

省商业厅党组在整党中坚持边整边改的方针，把整党和商业改革紧密结合起来，用整党促进商业体制改革，取得了较好效果。

他们在学习文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老框框和习惯势力的束缚，本着“清‘左’、放权、搞活”的原则，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建立工业品贸易中心、下放省属的工业品二级批发站、改革批发体制、改革国营零售商业体制、改革劳务性行业体制、改革集体商业管理以及企业奖金分配、给企业放权等几个方面，积极进行了改革。目前，原省属二十多个日用品、工业品二级批发站，已全部下放给所在市领导和管理；在郑州、安阳、开封、漯河、周口等市，建立了一批工业品贸易中心；同时国营零售商业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也正在进行试点。下放给市的二级站与市公司合并后，撤并了同城一地重叠的批发机构，大大减少了商品流转环节，加快了商品流转速度，使商品尽快与消费者见面。工业品贸易中心的建立，进一步搞活了批发，搞活了流通，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都可进行广泛交易。安阳工业品贸易中心，开业后第一次举办展销会，五天内成交额就达六千多万元，相当于该市百货、纺织品、五金交电三个

众。三中全会以来，王在县外贸局仍参与帮派活动。在整党试点中，根据王党振所犯错误的事实，经支部党员大会讨论，对王劝退出党，但他拒不接受，表现不好。面对这种情况，吴兆明同志却不顾党的原则，亲自出面，多次找县委及有关领导为王说情，要求从轻处理。并以“王的问题在后河公社，我们不了解”等为由，迟迟不向县委报送处理材料。中央整党决定公布后，吴又违背组织原则，于一九八三年

十月、十一月两次召开已经解散了的“支委会”（整党试点期间临时建立的党支部），强行通过他提出的“让王党振再写个检查，由劝退出党改为撤销党组成员、留党察看一年”的处理意见，报送县委组织部。同年十二月六日，县委研究决定将王党振劝退出党并发出通知。吴又以“王党振不在家”为借口，继续拖延，并再次找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为王说情、开脱。在县委的再三催促下，吴才于一九八三年十二

批发站两个月的销售额。郑州工业品贸易中心开业后，迎来客商上万人，吸引外地和本地商品四万多种。从国营零售商业和劳务性行业的改革试点情况看，效果也是好的，特别是转为集体经营或租赁给个人经营的企业，经济效益更为明显。如舞阳县浴池，过去长年亏损，实行类似租赁的办法承包给一位工人经营后，除年上缴利润五千元外，本人也成了万元户。实践证明，进行商业体制改革，不仅使企业经济效益大大提高，而且促进了企业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对国家、企业、职工、消费者都有利。

他们是怎样把整党与商业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整党促进商业体制改革的呢？概括起来主要抓了以下几点：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深刻理解商业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

为了使整党工作和经济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厅党组在讨论整党整什么的时候，就引导大家围绕商业工作如何服从于、服务于全党的总目标、总任务这个总题目，深入地开展了讨论。大家用大量事实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大好形势，认识到，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出现了带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农村经济已经开始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商品经济转化；由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化农业转化，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必须做出相应的变革，否则生产力的发展将要受到限制。事实也正是如此，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上商品充裕了，过去那种“买家求卖家、零售求批发”的状况也必须改变。市场上，竞争出现了，过去那种“坐门待客”的官商作风，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同时，大家还认识到，我国现行的商业体制是在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形成的。长期以

月三十一日在党员大会上宣布执行。

更为错误的是，内黄县外贸局干部王改朝同志，在整党中因揭发了吴兆明包庇王党振的问题，吴在王改朝晋升助理统计师职称问题上进行刁难。在县和地区技术职称评委会根据王的晋职考试成绩和其他条件，同意王晋升为助理统计师之后，吴仍以种种借口，不在王的晋升职称呈报表上签署意见，致使王改朝同志的职称批准手续一直未能办理。

吴兆明同志包庇“三种人”，刁难揭发人的错误被揭露之后，濮阳市委组织力量协同内黄县委进行了查证落实。濮阳市委研究决定：王党振定为打砸抢分子，由劝退退党，改为开除党籍。吴兆明包庇王党振，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王改朝同志敢于向错误行为作斗争，应予支持和表扬，对因此而影响王改朝同志晋升技术职称的问题，有关部门已经给予妥善解决。

（转自省委《整党工作通报》）